

责任编辑：党德信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金冲及 著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91年8月第一版·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375 插页：4 字数：162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7—5034—0396—9/K·0280

定价：3.50元

目 录

- 一、祖国在危急中……………(2)
- 二、“洋人的朝廷”……………(8)
- 三、新的社会力量在成长……………(14)
- 四、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24)
- 五、戊戌维新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31)
- 六、留日学生趋向革命的转折……………(39)
- 七、苏报案……………(44)
- 八、革命力量的集结……………(48)
- 九、中国同盟会的成立……………(54)
- 十、早期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59)
- 十一、要不要革命的一场大论战……………(66)
- 十二、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74)
- 十三、光复会、岳王会的革命活动……………(83)
- 十四、清王朝覆亡前的大混乱……………(92)
- 十五、立宪派发动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99)
- 十六、广州新军起义和“三·二九”起义……………(110)
- 十七、四川保路运动……………(119)
- 十八、文学社、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130)
- 十九、武昌首义……………(139)
- 二十、各省的四起响应……………(146)
- 二十一、南京临时政府……………(153)

二十二、袁世凯夺取胜利果实.....	(161)
二十三、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170)
二十四、建设梦想的破灭.....	(176)
二十五、初期新文化运动.....	(183)
二十六、世界范围大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189)
二十七、新时期的开端.....	(194)
后记.....	(199)

二十世纪已经进入最后十年。在行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当打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时，中国人面对的是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悲惨图景：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正耀武扬威地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统治中国的是年代久远地重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专制政府。中国人民生活在苦难深渊里，并且在世界上处于被轻视、被奴役的地位，时刻面临着灭亡的威胁。这种悲惨的命运，是每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所无法忍受的。为了拯救祖国，为了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社会进步的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在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探索，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斗争。

在二十世纪初写下的最早的光辉篇章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这样一场有着比较完备的近代民族民主政治纲领并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在中国过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有骨气、蕴藏着巨大潜力的民族，决不会甘心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当许多人认定这个古老的民族已经濒临灭亡的时候，它却出人意料地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为民族的重新振兴开拓了道路。

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应该说，这两方面同时存在。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已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旧有的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而且使民族觉醒和民主精神在全国普遍地高涨起来。这就把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走向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梯。这不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吗？可是，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革命的果实又落到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里，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国家。辛亥革命一度在人们心里燃烧起的热切期望很快就破灭了，留下的仍是一片令人难熬的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革命不又是失败了吗？但一次革命的价值不能单从它的短期效果来衡量。如果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它对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磨灭的。

辛亥革命是我们的前辈八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国土上以血的代价进行的一次伟大实践。那些在黑暗年代里为祖国独立、富强和进步而斗争的先驱者的业绩，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能够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中国近代的国情，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值得我们为之深思。它对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凝聚力量，万众一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腾飞而努力，将永远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

一、祖国在危急中

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实。

一百五十年前，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脱开了原有的轨道。从这时候起，中国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完整主权，走上半殖民地的悲惨道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到处可以看见那些傲慢的、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趾高气扬地支配一切的洋人老爷，看到那些用步枪、刺刀以至机枪、大炮任意杀戮中国百姓的外国军队，看到那些在工厂、矿山中冷酷地榨尽中国劳苦大众最后一滴血汗的外国资本家们。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听人摆布。亡国灭种的阴

影，沉重地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曾满怀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这一切，不能不深深地刺痛每一个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中国人的心，驱使他们苦心焦虑地去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实。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要谈辛亥革命的历史，不能不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说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活动是在这次战争期间开始的。这次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果拿战争以前同战争以后比较一下，不难看到，中国的内外局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是在完全缺乏精神准备的状况下，不自觉地卷入近代历史时期的。鸦片战争的炮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人们感到震惊，突然发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外部世界，但他们一时并不能立刻认清周围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魏源在当时是能够睁开眼睛重新看待世界的思想家，他在《海国图志》中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了解的外国的各方面情况，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认真说来，这种了解仍是很表面的。《海国图志叙》中写道：“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可能只是当年准噶尔事件的重演，只要实行了“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条，中国并不难重新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

十多年后，又发生了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这次战争延续了四年之久。联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的精华——圆明园，清朝朝廷被迫逃亡到承德，最后签订了《北京条约》，这给中国人的刺激自然很大。但战争结束后不久，

^① 谭嗣同：《有感一章》，《谭嗣同全集》，页四八八。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朝的统治秩序又暂时稳定了二十年。这使许多封建士大夫兴高采烈，在心理上仿佛已获得足够的补偿。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着着进行，近代工业的开始兴办，新式陆海军的训练等等，使人一度产生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同治中兴”的赞颂，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被高唱入云的。直到甲午战争前夜，进步思想家郑观应觉得需要向社会发出“危言”了，仍不敢公然指出中国已处在“衰世”这个事实，而把他的书称为《盛世危言》，以免招来太多的不满和攻击。梁启超说过：“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① 许多人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确实还处于相当麻木的状态。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洋务运动中人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那样快地溃败了。虚幻的安全感突然消失。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的一个省——台湾被割弃，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地被开放为商埠，日本人被允许在中国所有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还要向他们支付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② 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玉锷）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③ 这自然更使中国人感到难堪和坐卧不安。这一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直报》上接连发表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文章。第一篇《论世变之亟》中，劈头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④ 最后一篇《救亡决论》，第一

① 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九册，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② 其中三千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

③ 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页三四。

④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页一。

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他在给吴汝纶的一封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①许多人在惨痛的事实前猛醒过来，觉得放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需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如果周围局势不突然发生如此令人心悸的剧变，人们的思想要在短期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变动是无法想象的。

“救亡”，成为一切爱国者心目中最响亮、最有吸引力的中心口号。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历程中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甲午战败给中国的打击已经够沉重了。过了两年多，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又成为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攫取势力范围的新起点。一八九八年初，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皇帝时，大声疾呼地痛陈局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②戊戌维新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走向高潮的。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戊戌维新运动，表现出上层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新的民族觉醒。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更表明直接承受帝国主义侵略重压的下层劳动人民，决不甘心默默忍受外来的侵略和奴役。他们不顾一切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共同向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政府逃往西安。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回忆道：他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天好像塌了下来似的，立刻放声大哭。这以后，

① 严复：《与吴汝纶书》，《严复集》第三册，页五二一。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页一八九。

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武装占领北京达一年之久。他们在北京颁布戒严令，由各国分区管制，强迫居民悬挂他们的国旗，任意进行屠杀和洗劫。在天津，建立所谓“临时政府”。并且不时地派遣军队到直隶北部地区进行“讨伐”。一九〇一年九月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支付赔款达四亿五千万两，拆毁大沽炮台，在使馆区和从北京到山海关的沿铁路重要地区由外国派兵驻守，清政府并承担了镇压“与诸国仇敌”的爱国活动的责任。在这个时期，沙皇俄国的军队一直占领着并准备进一步吞并整个东北。这一切，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度的屈辱和痛苦，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开始陆续撤兵，民族矛盾从某些方面看起来，有了一些缓和。但如果深入一层来观察，就会看到，民族危机其实是向着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了。

如果说，一九〇一年以前，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直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那么，到一九〇一年以后，它们便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的特权，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时期获得的侵略成果。这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骤上的一个严重进展。

这种投资的集中点，是建筑铁路和开矿。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正太铁路、沪宁铁路、滇越铁路等陆续开筑。列强通过借款或强行承筑等方式，实际上控制了这些铁路。他们不但获得一定年限内对某些铁路事业的管理权，获得优厚的借款手续费、利息和红利，并且使铁路通过的区域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开掘矿藏，不仅提供给外国企业家以优厚的超额利润，并且也提供给它们可靠的原料来源。中国的铁矿生产，当时全部在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下开采。煤矿生产，据一九〇六年统计，外资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八，中外合资占百分之四十，两者合计占百分之八十四点八。

许多人强烈地感到：外国人一旦完全控制了我国的铁路和矿

山，那就是握住了我们的命脉，就要吸干我们的骨髓，这在某种意义上比明火执仗的侵略更为危险，更能置中国于死地。在二十世纪初出版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中，到处可以读到这一类沉痛的词句：“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筋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①“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②

在这段时间，列强对华的商品输入也急剧增加。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的短短五年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陡增一倍以上。长沙、秦皇岛、鼓浪屿、腾越等地相继辟为商埠。许多内地城市，也开来了外国轮船，出现了许多俨然以主子姿态君临到中国国土上来的“洋人”，激起人们的愤怒和不安。

列强们还在中国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争夺的焦点是中国的东北。沙俄的军队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中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战后却迟迟不肯撤兵。一九〇二年十月，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呈沙皇的有关满洲问题的备忘录中明白提出：要“把北满归并俄国”^③。这使许多爱国者更感到寝食难安，把它看作帝国主义列强就要动手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灭种的惨祸，仿佛时刻都可能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假托别人的口说道：“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

① 《南方之三大铁道》，《江苏》第七期，记事，页一四七。

② 飞生：《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浙江潮》第一期，大势，页一。

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二九八。

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一定是实了。你看德国占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于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于今还来问真问假，真正不知时务了。”^①这段话，确实反映出当时无数爱国者为祖国命运而忧心如焚的急迫心情。

紧接着，日本和沙俄又为争夺远东霸权而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延续达一年半以上。它在中国东北的国土上进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九一〇年，日本正式吞并同中国一水相隔的邻邦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强烈的刺激。

“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离开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辛亥革命有正确的理解。

二、“洋人的朝廷”

在这样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所期望的是有一个能够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府。而清朝政府却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这个王朝，本来虽然早已日趋衰败，但外表上仿佛仍是个威严显赫的庞然大物，使人望而生畏。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清

^① 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二册，页一一一七。

朝政府的打击不仅是沉重的，并且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说，这次战争充分撕开了清政府反动腐朽的真面目。三十年来一直被大吹大擂说成可以“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从军事上说，长期以来被清朝政府倚为柱石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尽管一部分将士作了英勇的抗战，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和错误指挥，在战争中仍然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使清朝政府在转眼间失掉了用来维持自己统治的主要镇压力量，形成一时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从财政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虽早已财用日竭，但在百计搜罗后还可勉强应付，使收支勉强维持平衡；战后赔款二万万三千万两银子，其中第一年就要支付八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岁入总额，这下子，财政平衡立时遭到根本破坏，陷入一片混乱，再也无法收拾。日本割据台湾，最初还要割取辽东半岛，清政府连“祖宗发祥之地”也无法得到保障，国家的首都门户洞开，继续生存遭到直接的威胁。它在人民中的威信也就扫地以尽。

对外的投降，并且屈辱到如此地步，内部腐败的充分暴露，使这个一向把自己装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顿时在人们心目中丧失了尊严。军事和财政力量的极端空虚也使它的统治无法继续保持稳定。可以这样说：甲午战后的清政府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中勉强再维持了十多年。

接着发生的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完全投降帝国主义，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这以前，清朝政府虽早已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并同它们一步步加紧勾结，但毕竟还不甘心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而在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推动下，在各种条件的凑合下，即便表现得十分被动和动摇，还曾参加过反对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后，这样的抵抗也不再能看到了。

一九〇一年二月，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

朝政府立刻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腼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一九〇二年一月，清朝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他们从开封到正定这段路，坐的是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当一月二十八日各国使节受接待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二月一日，她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① 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具有象征性，微妙地显示出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政治关系上的变化。

这以后，清朝政府在各方面更加坚决地执行对外投降的政策。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人民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需要看外国人的颜色行事。各级地方官更加兢兢业业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②

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毫不奇怪，人民大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三八八。

② 《论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势》，《新民丛报》第二十号，页一一〇。

么？”^①“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点破后，立刻不胫而走，在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初年，清朝政府对人民经济上的榨取也进一步加重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两个：首先是对外支付巨额的赔款。《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本息相加，每年需支付赔款二千余万两。这样巨额的赔款几乎是当时的中国人难以偿清的。清朝的财政从甲午战败后本已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就受到更加重大的打击，只得采取向外大举借债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勉强维持下去，在政治上也就更加俯仰随人。各地还要支付几千万两的地方赔款。这些都要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其次是清政府在国内加紧扩军，除袁世凯练成的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外，还计划在每个省编练新军一镇，作为维持他们统治的武装力量。军费的开支大大增加，又必需向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搜刮。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滞，政府的财政收支一向难以有过快的增长。直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上都稳定在八千万两左右。但到一九〇三年，岁入已达一万万四千九十二万两；到一九〇八年，岁入达二万万三千四百八十余万两。^②而到一九一〇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度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岁出达三亿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十几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竟激增至四倍之多。这在人们生活中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所谓岁入的逐年猛增，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来自竭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课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任意诛求，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使人民到了再也无法

^①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页三六。

^② 明水：《日人论中国整理财政策》，《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页三八至四三。

忍受下去的地步。连素来温和的《东方杂志》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饥黎盈野，贼盗满山。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诎非今日吾人杂触杂受之显象耶？若犹委心任远，不急起而补救，泄泄沓沓，冀幸免于朝夕，则其势之不可五稔^①，固又不俟智者而后知也。”^②

但是极端腐朽昏聩的清朝政府又怎么可能“急起而补救”呢？他们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过一点积极作用，却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民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政府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的地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二日和十六日，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两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③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兴起，它的真正内容和动力是反满。这只是皮相之见。满汉矛盾是不是存在？是的。这在清朝入关时一度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直到清末，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已经使自己逐步成为包括汉族地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族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也由于封建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满汉矛盾早已退居次要的地位。单从满汉矛盾本身，根本无法解释它在二十世纪初怎么会突然激化到如

① 就是说其势将不能维持五年。

② 胜因：《实业救国之悬谈》，《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六期，页一九二。

③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篇，页八七、八八。

此程度，以至会引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如何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的危急形势下拯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这才是先进分子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其他任何问题都不能不服从这个前提。我们可以拿章太炎的思想变化过程作为例子来剖析一下。

章太炎是从小就深受汉族传统民族思想影响的。但他是否就此投身于反清革命？没有。恰恰相反，直到甲午战后，他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时，政治上仍没有超越改良派的藩篱。在他看来，在当前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急面前，发生革命是危险的：“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杆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他把温和的改革称为“革政”，并得出结论：“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①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这种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他在一八九九年写的《客帝篇》中继续主张：有帝国主义在旁，如果汉族人民起来反对满族统治者，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共归于尽：“犇牛之斗，玄熊咆哮以格其间，则二牛皆齧也。”“逐加于满人，而割地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响。”

决定章太炎转变的，是八国联军的进攻和占领北京。这下使他看清：清朝政府已经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不可能再依靠它来图强御侮，因而写下了《客帝匡谬》：“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并且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②

事实说明：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清朝政府卖国面目的暴露，而不是别的，才最后驱使章太炎走上革命的道路。决定他的行动的，是为救国而反满，并不是为复汉而反满。

事实也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的高涨，根本的原因不

^① 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十九册。

^② 章炳麟：《客帝匡谬》，《馥书》前录，页四、五。